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大学“985工程”二期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基地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藏学学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第5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藏学学刊

第⑤辑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洁如
责任校对:徐 凯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学学刊. 第5辑,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614-4483-2

I. 藏… II. 四… III. 藏学—文集 IV. 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1749 号

书名 藏学学刊 (第5辑)

主 编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483-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9.5
字 数	467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 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藏学学刊》学术顾问

主 席：王 尧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冉光荣 石 硕 许广智 李绍明 张 柏
张建世 周伟洲 格 勒 袁晓文 霍 巍

本期主编：霍 巍 石 硕

执行编辑：张长虹

目 录

论 文

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及相关人群系统研究	石 硕 (1)
西藏带柄铜镜补论	吕红亮 (33)
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霍 巍 (46)
有关藏文史料 nam “难磨” 的记载补正	杨 铭 (61)
再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陆 离 陆庆夫 (69)
关于榆林窟第 25 窟营建时代的几个问题	沙武田 (79)
“鞬鞞带” 综论	马 冬 (105)
Some Remarks on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Tibetan Word <i>bam po</i>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114)
小议藏文中 <i>bam po</i> 一词的意义和用法	范德康 著 刘翠兰 译 (133)
《律经》的结构	罗 鸿 (150)
清代以前西藏司法特征略论	袁 剑 (174)
汉代至民国藏彝走廊地区人群类别称谓及其嬗变 ——以汉文史籍的记载为中心	陈 东 (183)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汉藏通婚研究	邹立波 (198)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及其意义	周伟洲 (208)
民初蒙藏边疆“自治”：“自治地方”或“自治国”	冯建勇 (221)
西藏与中亚及新疆历史关系分析	冉光荣 徐 君 (229)
流动的边界：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格蒙寺为视角中心	石 甜 (235)
阿坝州藏羌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价值及对策	庄春辉 (248)

译 文

- 十忿怒尊图像考察 森雅秀 著 张雅静 译 (258)
- 吉尔吉特写本封面和“书本崇拜”
..... 德波拉·金伯格-萨特 著 贾玉平 译 (275)
-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 T 形题记框 今枝由郎 著 张长虹 译 (286)
- 英文摘要 (291)

Content

Essays

-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arcophagus Tombs in Tibetan—Yi Corridor Areas and
Its Related Clans SHI Shuo (1)
- A Research Note of the Bronze Handle—mirror of Tibet LÜ Hongliang (33)
- A Rediscussion of Some Issues Related to the Sleb ri Tombs in Tibet
..... HUO Wei (46)
- Commentaries on the Records of *nam* in the Related Tibetan Historical Materials
..... YANG Ming (61)
- A Second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ubo Institutions and Turkic State
..... LU Li & LU Qingfu (69)
- Some Issues on the Dat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Yulin Cave 25 SHA Wutian (79)
-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Diexie Belt MA Dong (105)
- Some Remarks on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Tibetan Word *bam po*
.....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114)
- Some Remarks on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Tibetan Word *bam po*
.....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translated by LIU Cuilan (133)
- The Structure of the *Vinayasūtra* LUO Hong (150)
- A Brief Discussion of Tibet's Judicature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 YUAN Jian (174)
- On the Classification Titles, Evolution of the People Groups in the Area of the
Tibetan—Yi Corridor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Focus on the Records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 CHEN Dong (183)
- A Study of Sino—Tibetan Inter-marriage in Kham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ZOU Libo (198)

- Buddhis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ZHOU Weizhou (208)
- The “Autonomy” of Outer Mongolia and Tibe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utonomous Region” or “Autonomous State” FENG Jianyong (221)
-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 RAN Guangrong & XU Jun (229)
- Diffuse Boundary: Ethnography on a Tibet Buddhist Temple SHI Tian (235)
- The Values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Utilize the Tibetan—Qiang Cultural Ecology
in the A Ba Region ZHUANG Chunhui (248)

Translated Essays

-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 ten Fierce Deities
..... MORI Masahide, translated by ZHANG Yajing (258)
- The Gilgit Manuscript Covers and the “Cult of the Book”
..... 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translated by JIA Yuping (275)
-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in Magao (Dunhuang) and Yulin Caves
..... Yoshiro IMAEDA, translated by ZHANG Changhong (286)

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及相关人群系统研究^①

石 硕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 藏彝走廊地区发现了数量巨大、分布密集的石棺葬,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西汉末年, 延续达两千余年, 是认识这一地区古代人群历史文化面貌的基础, 同时也是揭示古代藏彝走廊人群系统及族属源流的一把钥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 对这些石棺葬的文化面貌及相关人群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

关键词: 藏彝走廊 石棺葬 族属系统

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石棺葬数量巨大、分布密集, 几乎遍及整个藏彝走廊区域, 同时由于整个藏彝走廊区域的石棺葬不仅存在着明显的共性, 而且年代跨度极大,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西汉末, 时间绵延达两千余年。因此, 从很大意义上说, 石棺葬既是我们认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末期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之历史文化面貌的基础, 同时也是我们揭示古代藏彝走廊人群系统及族属源流的一把钥匙。本文拟对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及相关人群系统等问题作一系统的探讨。

一、石棺葬在藏彝走廊的分布与特点

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 藏彝走廊地区最重要、最普遍的考古遗存, 是一种被学术界称作“石棺葬”的墓葬文化。所谓“石棺葬”, 又被称作“石棺墓”、“石板葬”或“石板墓”^②, 是一种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为主要葬制的考古文化遗存。

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发现可追溯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1938 年, 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在岷江上游(今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进行调查时, 曾发现和清理过一座石棺葬残墓, 写成《汶川县小寨子残墓发掘记》, 于 1951 年发表于成都《工商导报》^③。这是考古专业学者对该区域石棺葬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开端。1944 年,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学者葛维汉(D. C. Graham)也曾报道过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的分布、墓葬结构和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藏彝走廊的民族互动与文化发展”(05AMZ002)的阶段性成果, 并获四川大学 985“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资助。

② 陈祖军:《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 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1951 年 5 月 20 日成都《工商导报》。

出土文物。^①1964年,四川大学童恩正赴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理县等地作考古调查,在当地清理和发掘了28座石棺葬,并将此次清理情况与1938年冯汉骥先生清理的资料合并,写成《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发表于《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首次对岷江上游区域的石棺葬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研究,也使石棺葬这一独特的考古遗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此后,除了岷江上游地区外,石棺葬墓群在藏彝走廊的其他地区如澜沧江上游、金沙江上游流域、雅砻江流域、大渡河中上游流域、青衣江流域以及滇西北和滇中地区也被大量发现。

石棺葬墓地多集中分布于藏彝走廊区域各个河流台地上,墓地中石棺葬均呈密集排列,或数十座、数百座乃至数千座不等。许多石棺葬墓地不仅规模极大,墓葬数量众多,且石棺葬地点在藏彝走廊区域的分布范围也极为广泛和普遍。因此,可以认为,石棺墓葬是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后藏彝走廊地区最主要的一种考古文化遗存。

需要指出的是,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的石棺葬并不是藏彝走廊地区独有的葬式。事实上,石棺葬式在我国东北、华北北部及西北的甘青地区均有发现。童恩正先生在《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曾对广泛分布于我国从东北、西北到藏彝走廊地带的石棺葬作过一些比较和讨论。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此广袤的地域之内,石棺葬又有地区的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葬均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②这一看法完全正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在我国东北、西北和藏彝走廊这3个石棺葬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中,藏彝走廊地区可以说是石棺葬分布数量最大、最密集和最普遍的一个区域。迄今为止,藏彝走廊区域经正式发掘的石棺墓地已有近40余处,约700座墓葬。此外,该文还调查核实了一大批墓地。

根据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发掘情况及有关研究,目前可以初步确认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末年,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绝大部分石棺葬均属于这一年代范围。在进入东汉以后,石棺葬这一独特葬式在藏彝走廊地区大幅度减少或渐趋消失,所以,东汉以后的石棺葬已极为罕见。目前仅发现有极个别和零星的几座属于唐至元明时代的石棺葬,但这些石棺葬主要为火葬墓,即焚尸后葬骨,可视作仅保留石棺葬式的火葬石棺墓,实际上只是东汉以前流行的石棺葬的一种残余形式^③。所以,石棺葬的主要流行时代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时期,进入东汉以后,石棺葬开始呈现大规模衰落之势。

第二,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有着明显的共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以石棺为葬式,这一独特形式的古代墓葬虽然目前在我国东北、内蒙古、陕西、新疆均有发现,但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来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明显不同于东北、西北及其他地区石棺葬的特点,而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二,分布于藏彝走廊各地的石棺葬无

① [美] 葛维汉:《在羌族地区的一次考古发现》,载《华西北疆学会杂志》,第15卷,华西协合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③ 罗开玉在对藏彝走廊石棺葬的分期中虽将唐至元明时期的石棺葬分为一期,但也认为,从整体看,东汉以后的石棺葬实际上只见其残余形式。参见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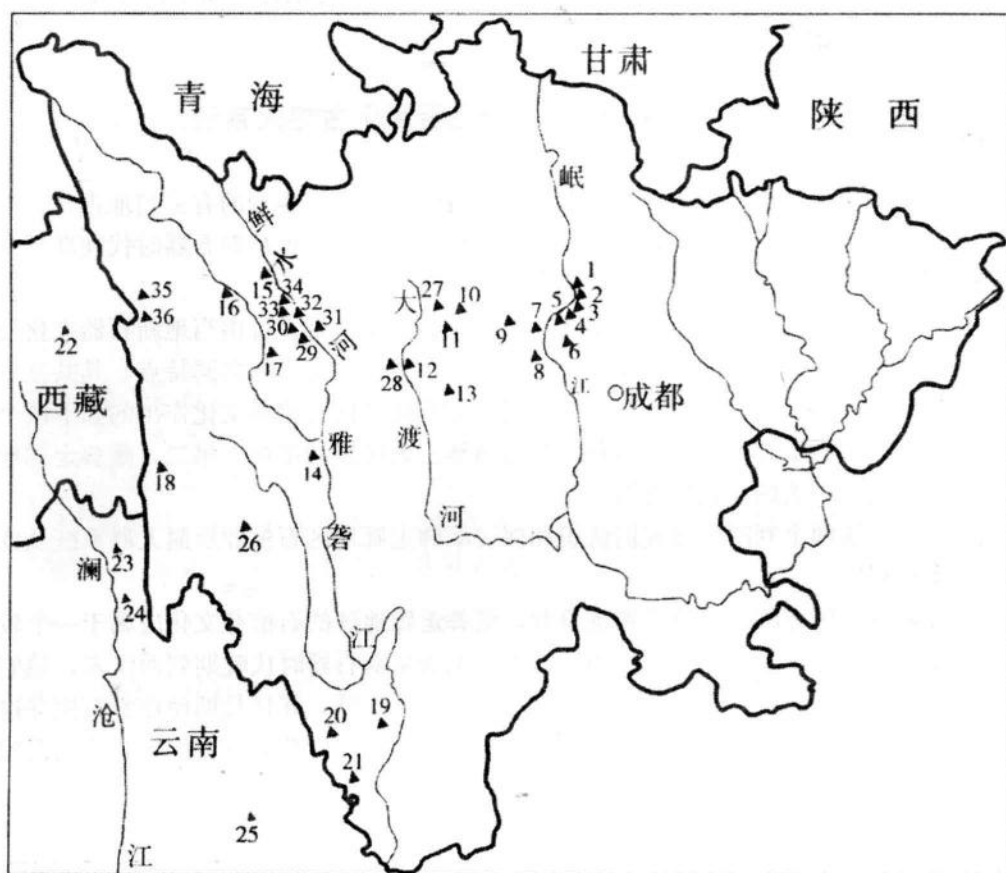


图1 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墓地分布图

1. 撮箕山 2. 茂县城关 3. 勒石村 4. 营盘山 5. 别立 6. 萝葡寨 7. 牟托 8. 昭店村
9. 佳山 10. 子达砦 11. 朴头 12. 罕额依 13. 老声树 14. 呷拉 15. 卡莎湖 16. 吉里龙
17. 木娘岗 18. 扎金顶 19. 盐源 20. 大兴镇 21. 龙潭 22. 香贝 23. 纳古 24. 石底
25. 鳌凤山 26. 乡城 27. 日隆 28. 丹巴折龙村 29. 炉霍仁达 30. 炉霍尤斯遗址
31. 炉霍通龙村 32. 炉霍城中 33. 朱德寨子 34. 炉霍宴尔龙 35. 德格喇格

论是川西高原、滇西北或藏东地区，虽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并可据其差异划分为不同的地方类型，但与这种差异相比，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共性则更为突出。目前，在各地石棺葬随葬器物中，皆以陶器中大双耳罐、单耳罐、小平底罐，铜器中的曲柄剑、扁茎无格短剑、三叉格剑、小铜刀、圆形饰牌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共性要大于其差异性。因此，有学者认为，从考古学的文化定义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可以说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①。

第三，与东北、西北及其他地区的石棺葬相比，藏彝走廊是目前国内石棺葬墓地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这也足以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时期，石棺葬既

① 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是生活在该区域的古代人群普遍采用的葬俗和埋葬方式,也是他们留下的主要考古文化遗存。

二、藏彝走廊石棺葬人群是否属于古羌人系统

毫无疑问,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遗存,本身蕴藏了异常丰富的有关当地古代人群生活情况及文化面貌的信息。从这一点来说,石棺葬乃是我们认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末这一阶段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面貌的重要实物材料。

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既然与当地新石器文化相衔接,是直接由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而且从文化内涵看,整个藏彝走廊范围的石棺葬存在突出的共同特点,其共性要明显大于差异性,因此,笔者赞同罗开玉先生对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文化作出的如下两个基本判断:第一,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主要是当地土著民族的遗留。第二,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同属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笔者认为,这两个判断乃是我们认识和探讨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所属人群系统及族属面貌的基本前提。

很明显,从石棺葬的诸多特点和迹象看,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文化应属于一个较大的人群系统。这个人群系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末,他们都主要生息和活动于藏彝走廊这个区域,是该区域的主体人群,并且长期使用着石棺葬这一极具共性的埋葬方式。那么,藏彝走廊石棺葬这个人群系统究竟属于古代什么族属面貌的人群?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原本是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人群系统,他们大约是在距今6000年前后逐步南迁,开始进入到藏彝走廊地区。约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这些由甘青地区南迁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已分别在藏彝走廊北部的澜沧江上游和川西高原的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一带建立起了一些较稳定和规模较大的居住聚落,形成了较成熟和繁荣的新石器文化,并与甘青地区同时代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分野和平行发展的态势。现在我们不清楚的是,这些至少在距今约6000年前后开始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南迁进入藏彝走廊地带的新石器人群应属于什么样族群面貌的人群?他们是否可被称为“古羌人”?或者说他们与后来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古羌人”这一族群面貌的人群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很显然,要想直接搞清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群系统的族属面貌几乎不可能,这不但因为新石器时代与后来的历史时期相隔甚远,同时要用后来历史时期才出现的“族称”、“族属”这类概念及相关记载来探讨更遥远时代之人群的族系特点除了难以实证之外,本身也具有客观上的不可能性。但是,有一个事实给我们提供了将两者联结起来的链环和可能性,这就是既然藏彝走廊的石棺葬与当地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直接继承关系,是由当地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而藏彝走廊的石棺葬的年代下限已延伸到历史时期,这就为我们确定藏彝走廊石棺葬人群的族属系统及文化面貌提供了可能。

第一个问题是:藏彝走廊的石棺葬人群是否属于古羌人系统?目前要将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人群与古羌人联系起来,在史实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难点。

首先,按照先秦文献史籍的记载,在当时被明确称为“羌”的人群主要实行火葬。《荀子·大略篇》记:“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篇》云:“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墨子·节葬下》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列子》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登遐’,然后成孝子。”《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以上这些记载多出自先秦的文献,说明早在秦以前,羌人已普遍有习行火葬之俗。羌人行火葬这一习俗也为以后的文献典籍所记载,如《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死则焚尸,名曰火葬”。羌人既然在先秦时期已普遍实行了火葬,而石棺葬就其性质而言乃属土葬,这就使我们很难将藏彝走廊地区从新石器晚期迄于西汉末年的延续时间如此之长、且数量如此丰富的石棺葬同历史上的“羌”这一人群系统相联系。

其次,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确有关人自西北南下进入藏彝走廊的岷江上游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

羌无弋爰剑者……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獫狁。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据这段史料的记载,既然公元前4世纪由西北向南迁徙即“将其种人附落而南”的羌人已到达了今甘肃南部与川西北相接的武都、广汉及今四川西昌的越嶲一带,那么羌人显然已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而且可以肯定,南下到越嶲一带的羌人显然是经由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过去的,这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可得到进一步印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记叙当时位于岷江上游一带的汶山郡时,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华阳国志·蜀志》亦云:“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均证明在汉代地处岷江上游的汶山郡境内确有关人部落的存在。明朝初年,茂州汶山县官员亦称当地有“羌民二十八寨,言语不通”^①。很显然,今天仅存在于岷江上游地区并作为目前我国56个民族之一的羌族,正是历史上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古羌人的一个孑遗。需要指出,今天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区的被称作“羌族”的人群虽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上的“羌人”,因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他们中显然已不同程度地混杂或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成分,但他们与历史上迁入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或者说他们今天之所以被定名为“羌族”,很大程度正是历史上由西北南下的“羌人”进入岷江上游地区的一个结果则大体可以成立。事实上,今岷江上游地区被称作“羌族”的人群,其先民是从西北迁徙而来这一点不仅为他们自己所认同,也在他们的史诗、传说和文化习俗中得到较充分的反映。^②所以,他们或者说他们的主体是历史上羌人的后裔大体没有问题。

^① 《明太祖实录》卷195,洪武二十二年三月辛巳。

^②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今天居住于岷江上游地区并被确定为羌族的人群却并不认同当地的石棺葬是他们祖先的遗留,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不同的一种异类人群的遗留。这一现象甚为重要。据今岷江上游羌族中流传的古老叙事诗《羌戈大战》,传说在他们的祖先由西北迁来岷江上游一带之时,当地已经存在着一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戈人”或“戈基人”。他们的祖先曾与“戈人”进行过大战,直至打败“戈人”后,才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①按照羌族的传说,“戈人”较富有,并流行石棺葬。今岷江上游的羌族将当地的石棺葬称为“戈基戛鉢”,意为“戈基坟”。新中国成立前,岷江上游的羌族在过羌历年(羌族以农历十月一日为岁首)举行祭祀时,其端公(羌族巫师,羌语称“释比”)做法事的内容中,即要演唱羌族祖先与“戈基人”作战的情形,所以“羌戈大战”传说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人群中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得到普及和代代流传,是他们关于其祖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记忆中不仅包含了他们对祖先之光荣过去的夸耀,同时也是岷江上游羌族借以进行族群凝聚的一个重要符号。当年冯汉骥先生在当地调查石棺葬时即称:“羌人对于此类战争之故事,尚津津乐道。”^②所以,有关“戈基人”的记忆在岷江上游的羌族中是极为深刻的。这就提示了一条重要的史实线索——当地的石棺葬可能是由一个与今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之先民即历史上由西北南下到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完全不同类属的人群系统所遗留。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人群中流传的“羌戈大战”的传说,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人群的族属面貌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同时更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正确思路。正因为如此,该传说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的高度重视。早在1946年,华西大学的郑德坤先生即根据羌人的“羌戈大战”传说,认为石棺葬并非羌族先民的墓葬,而应是“羌戈大战”中被羌人视作异类的“戈人”的遗留,他指出:

长头型的戈人,基本上是一个农业民族。他们沿河而居,在台地上开垦土地,饲养牲畜。他们可能很好战,但过着定居生活,因此人死后就埋葬在住所附近。石板墓的外表,有点像成都平原上周秦时汉族盛行的陶棺和石棺,但是它的构造完全是沿着不同路线的,它是独特的和无与伦比的。此外,石棺葬也不是羌族祖先坟墓,因为羌族有史以来就实行火葬。^③

最早对岷江上游石棺墓进行发掘与研究的冯汉骥先生在论及石棺葬的族属问题时,同样对这一传说给予高度重视,他在文章中写道:

戈人的坟墓,羌人尚能指出,现在羌地凡有黄土地带,用石块所起之墓,即是此类。墓中所出铜器多与长城地带者相似,其中有一种特别的陶器,黑色大耳,饰以旋纹,有似西腊之 amphora 陶罐是也。余曾在汶川县之小岩子,亲自

① 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1984年版,第8~16页。

② 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载《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合刊本。

③ 郑德坤:《理番的石板墓文化》,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6年6月(英文),杜品光译,转引自李绍明、李复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

发掘一墓，其中出一铜股排、铜剑、铁剑、铜斧、铁斧、秦戈与各种小铜器、金项带、珠饰及文帝四铢半两钱 300 枚，其他各种佩饰，不类汉人，亦不类羌人。……羌人言此即戈人之墓也。^①

这里，郑德坤和冯汉骥均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不是羌人所遗留，而是由羌人迁来以前就生活在此的一种当地土著人群——“戈人”所遗留。这就是说，他们均主张石棺葬是当地较羌人更早居住于此的另一类人群所遗留。

但问题在于，岷江上游之羌族传说中的“戈人”或“戈基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族属种类的人群？对此，童恩正先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曾对“戈人”的族属给出过如下的解释：

在茂汶羌族的传说中，也不认为石棺葬是他们祖先所留，而称之为“戈基人”的墓。据说戈基人原为茂汶的土著，当羌族最初迁入这一地区时，即曾与之发生战争，并以白石和木棍战胜戈基人，定居于此，所以羌人至今崇祀白石。这种传说中的戈基人，有可能就是指在川西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氏族而言。^②

那么，“戈基人”是否即是“氐人”？此说是否能够成立？

综合来看，将“戈基人”确定为“氐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前面所引《吕氏春秋》记：“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荀子·大略篇》亦云：“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这些记载说明“氐人”与“羌人”一样，同样实行火葬。所以将石棺葬说成“氐人”的遗留，与“羌人说”面临的问题一样，也难以自圆其说。

第二，童恩正将“戈基人”确定为“氐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应与古代“冉駹”有关，而“冉駹”很可能属于“氐”。其依据是：

冉、駹的族属，虽然史无明文，但《后汉书》既说其地有“六夷、七羌、九氐”，则肯定该地有氐，而且氐的数量最多。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说氐族中有“婁氐”。如此则冉、駹为氐族的可能性最大。《华阳国志·蜀志》中虽未提到本地有氐，但很早就有人指出文中之“峒”应为“婁氐”之“婁”，可能是传抄致误。^③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童恩正将“冉駹”定为“氐”的证据明显较为单薄和牵强，且推测成分明显。事实上，在 20 世纪 40 年代，马长寿也曾据此提出过“冉”为“婁氐”的看法。但在 20 多年后，随着认识的加深，马先生对这一看法作了明确修正：

① 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载成都《工商导报》1951 年 5 月 20 日。

② 童恩正：《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载《思想战线》1978 年第 1 期。

③ 童恩正：《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氐族的几个问题》，载《思想战线》1978 年第 1 期。

二十多年前,我到四川西北部嘉戎地区考察半年,回来写了《嘉戎民族社会史》一文,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关于冉駹文中曾作了一些推论,现在看来,有的部分如分冉駹为二部,以冉即《魏略》中的冉氏,都错了。谓冉为冉氏,除了冉与冉同音外,实在没有其他根据,很难成立。^①

因此,马先生明确提出了汉代岷江上游地区的冉駹“非氏非羌”的观点。

第三,前面提到整个藏彝走廊地区的石棺葬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因此,从考古上看,它们本身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在汉文史籍中,除了明确记载汉代汶山郡一带有氏人活动外,我们均找不到任何有关氏人曾存在和活动于藏彝走廊其他地区的记载,更无关于氏人曾出现于滇西、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的记载。而且从今藏彝走廊范围内仅有其东部边缘四川平武一带的白马藏人自称是氏人之后裔来看^②,历史上的氏人显然并未大规模进入到藏彝走廊地区。因此,要将藏彝走廊地区分布范围广泛、数量众多且延续时间极长的石棺葬说成是氏人的遗留,显然缺乏充足依据。

所以,将戈基人判定为氏人的观点仍难以成立。

三、从史籍记载看藏彝走廊的石棺葬人群面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前辈学者均以敏锐的学术直觉意识到今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之民族志材料即“羌戈大战”及石棺葬为戈基人之遗留的传说,为认识和辨别当地石棺葬人群的族属面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依据这一线索,许多学者均认同当地的石棺葬应是同历史上行火葬的“羌”、“氏”人群不同类属且被“氏”、“羌”人群视作“异类”的“戈基人”之遗留。

既然“戈基人”不是今岷江上游地区羌族的先民,即不属于历史上的“羌人”,同时也不属于“氏人”,那么可以肯定,“戈基人”必定是较之历史上进入岷江上游的“羌人”和“氏人”更古老的一个土著人群。换言之,早在“羌人”和“氏人”迁入岷江上游地区以前,“戈基人”就已经存在于当地了。

那么,既不属于“羌”也不属于“氏”,且较“羌”和“氏”都更早的“戈基人”,究竟是一种什么系统或什么族属面貌的人群?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历史悬案。

但这个历史悬案并非无解。事实上,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途径只有一个——既然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年代跨度甚大,其年代下限已延至西汉末或东汉初,而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汉文史籍比较明确地记载藏彝走廊地区古代人群活动情况的时间正好也始于汉代,此局面为我们通过史籍记载与石棺葬考古遗存的相互印证来认识和探讨藏彝走廊地区石棺葬的人群系统和族属面貌提供了比较切实的可能性。

在现有汉、藏及其他民族文字的史料系统中,最早记载藏彝走廊地区人群情况的当为

① 马长寿:《氏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② 尚理、周锡银、冉光荣:《论“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缪钺、杨耀坤:《对“白马藏人”族属问题的探讨》;徐中舒、唐嘉弘:《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氏族说》;赵卫邦:《平武“白马藏族”的族别问题》;蒙默:《“白马番”渊源初探》。上述论文均载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内部发行),阿坝藏族自治州印刷厂1980年铅印本。

汉文史料系统。汉文史籍中,最早涉及藏彝走廊这一区域的人群及族属面貌的要算《尚书》。《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商之时:“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也就是说,商代末年参加周武王伐商的已有位于今西南一带的邦国和部落。“蜀”位于今成都平原没有问题,广汉三星堆及近年在成都金沙发现的时代极早、发展程度极高的古蜀文明遗址已能充分证明这一点。既然“蜀”参加武王伐商之役,那么位于蜀之西的部落也当然有参加的可能。故对《尚书·牧誓》的记载,蔡沈注曰:“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诗·小雅·角弓》曰:“为蛮如髳。”宋张澍《蜀典》卷一上称:“髳即旄牛种,即越嶲夷。”方国瑜先生指出:“旄牛以旄族得名,字或作犛、犛、髦、猫,并与摩字同音,而摩沙之‘沙’,在其族语中意为‘人’或‘族’。”^①故认为“髳”可能为“么些”之先民。但因《尚书·牧誓》所记参加武王伐商的八个邦国或部均未言其地望,且后世史家众说纷纭,所以,其中的“髳”是否是在“蜀”之西即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部落?它究竟可能是何种人群的祖先?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主要限于推测,尚缺乏确定性。

严格说,目前最早比较明确地记载藏彝走廊地区的人群及其族系面貌的当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一段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这段记载中共提到九个部落的名称,它们是:夜郎、滇、邛都、嵩、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同时,司马迁在记载中将这九个部落以其生计方式、习俗、地望和族系之异同而划分归并成了四个大类:

1. 夜郎、滇、邛都,“此皆魑结,耕田,有聚邑”;
2. 嵩、昆明则“皆编发,随牧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3. 徙、笮都、冉駹,“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
4. 白马则“皆氐类也”。

从司马迁所勾勒的这四个人群类别的特征看,夜郎、滇、邛都应是一类,他们均属“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部落,其习俗特点是“魑结”;嵩、昆明又是一类,他们是“随牧迁徙”的游牧部落,活动地域较广,“地方可数千里”,其习俗特点是“编发”;徙、笮都、冉駹这三个部落则“或土著,或迁徙”,即三者中既有定居的部落,也有迁徙的部落。由此推断,他们的生计方式既有以农耕为主者,也有以游牧为主者,甚至还可能有半农半牧的生计形态,他们均位于“蜀之西”。而位于“冉駹以东北”的白马诸部落,则“皆氐类也”。很显然,在上述四大人群类别中,司马迁明确给出了族属的人群惟有“皆氐

^①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